



刘瑞琦在孝义书院

“看这个单词,hotel, 两个元音字母中间只有一个辅音,辅音往后靠,叫‘一靠后’。”孝义书院里,刘瑞琦拿着白板笔站在白板前写写画画,面前围坐着一圈小朋友,跟着他朗读划分音节的口诀“一靠后,二分手”。他又在hotel下面画了两条粗线:“重音在第二个音节,读出来就是/həʊˈtel/。”

73岁的刘瑞琦身着红马甲,身形瘦高,无论是站着讲课,还是坐下来交谈,背始终挺得笔直。书院的门旁,靠着一辆陪伴他多年的旧自行车,往返周边村镇,这便是他最常用的代步工具。

“单词是用音来记的,不是用字母记的。你掌握这个,比你背一百遍单词都管用。”在火车上,在公园里,在书摊边,只要身边有小孩,他随时可能掏出笔来教几个单词。

“我喜欢和年轻人交流,喜欢这种被需要、被认可的感觉。”

这个在孝义书院教英语的73岁老人,很难让人把他和“大学教授”“中国好人”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。

2026年8月31日,中央文明办发布“中国好人榜”,西藏农牧大学退休教授、西安市鄠邑区图书馆孝义书院创办人刘瑞琦获评助人为乐类“中国好人”。

1982年7月毕业,他主动申请援藏。退休后,他辗转陕、川、滇,建起5座公益书院,累计投入50多万元,捐赠图书5万余册,开展阅读公益活动千余场,惠及群众十余万人次。

从在煤油灯下读《三国演义》的农村娃,到教了32年书的大学教授,再到建了5座乡村书院的“乡村阅读推广人”,刘瑞琦常说:“我的人生路是书铺就的。”

用书铺就的人生路

上午9点,杨春林推开孝义书院的门。

她在鄠邑区一家酒店做服务员,偶尔会有外国客人。4年前,她想学几句英语,听说孝义坊村有个书院可以学习,就来了。今天,她走进书院,坐在桌子旁,翻开英语资料,小声地跟着读。“我专门给她开了隔壁的房间,让她好好学习。”刘瑞琦说,“前年12月,鄠邑区甘亭街道关工委组织给困难学生捐款,她捐了200元。看她学习的样子,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”

刘瑞琦最早对书的记忆,是一本竖排繁体字的《三国演义》。爱书的起点也从这里悄悄埋进了他的心中。

1953年11月,刘瑞琦出生在孝义坊村,兄弟8个,加上父母和爷爷,共11口人。当时,村里没通电,“那会儿看书,都点着煤油灯,我们几个兄弟常常头挤在一起看书学习,看着看着,就听到吱吱声,头发烧着了。”

爷爷对他影响最大,他老人家喜欢听收音机里的国际时事。刘瑞琦放学回家,有时候会带份《参考消息》给爷爷看。“他就爱和人摆万国会的事。”(方言,意为聊国际大事)

刘瑞琦上学时,适逢三年困难时期。家里只有父亲一个男劳力,有一年,他交不起1元学费,生产大队开了证明:“该生系多子女户,免去学费1元。”“我记忆犹新,没齿难忘。”他说,“也许就是这1元钱,为我后来做公益埋下了伏笔。”

1970年12月,17岁的刘瑞琦应征入伍。他所在的班,是发电机班,要学发动机原理,没有课本,只能记笔记,他就托也是军人的二哥寄来一本《基础电工》,翻开发现,“学电得先学数学”。他就找驻地附近的老高中生借《代数》《几何》《三角》,把白纸裁成16开本,一本一本本地手抄。他还订了《数学学报》《数学的实践与认识》《数学通

人可以睡在地上,书一定要放在床上

——访「中国好人」刘瑞琦

陕师大图书馆二楼是教师阅览室,学生不能进,他因为常帮老师整理书籍杂志,被允许留在里面看书。

“我大学成绩不算好,很少上90分,也很少下70分,”他说,“但涉猎面很广,经常选修旁听其他系的课。”

1982年7月5日,陕西省高校毕业典礼在西安人民大厦礼堂举行,作为应届毕业生代表,刘瑞琦表了决心,主动申请去西藏。那本《袖珍英汉辞典》也被他带去了西藏。西藏农牧学院(现为西藏农牧大学)在林芝,海拔近3000米。刚去的时候,爬个楼梯都气喘吁吁,他这一待,就将近32年。

大学教授建起5座书院

到了学校,他发现学生英语基础参差不齐。学校里主要是藏族学生,也有汉族学生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。同一个课堂,学生的差距却很大。在援藏干部的帮助下,作为外语教研室主任的刘瑞琦积极推行“分层次教学”,使得“每个学生都能在原有基础上取得进步”。

32年里,他一星期最多上过36节课,包括周末的函授课、校外英语班,有部队的、医院的、银行的,哪里需要英语老师,他就去哪里。他的学生里,不少人都因为读书走向了“更远的地方”。“读书能改变命运。”他说。

这些年来,他攒下了5万册书。不管是家里还是办公室,到处都有他珍藏的书,有同事开玩笑说:“刘老师,你这哪是宿舍,是书库。”他笑着说:“人可以睡在地上,书一定要放在床上!”

2013年12月,他从西藏农牧学院退休。彼时,他带着自己攒下的上万册书回到内地。两层楼的角落全被书籍塞满,光铁皮柜就买了上百个。

看着满屋的书,他有了新的想法:“藏书越来越多,我逐渐意识到,不能让这些书躺在书柜里‘睡大觉’,要让它们‘动’起来、‘走’出去!”他一直对书院这种藏书授徒机构很崇尚,曾说:“你看江西白鹿洞书院、长沙岳麓书院,培养了多少栋梁之材!”

2013年6月,家乡户县(2016年12月,户县撤县设鄠邑区)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,建筑面积近6000平方米。



刘瑞琦捐赠《传世藏书》(123册),“这套书放在图书馆,谁都能来看”。这套书从先秦编到民国,非常有收藏价值,值得一读。

捐书还嫌不过瘾,他想建立一个属于老家孝义坊村的书院。乡党们听说要建书院纷纷来帮忙,安装书柜、整理书籍、打扫卫生。

2021年4月28日,在鄠邑区文旅局、区图书馆、甘亭街道办事处和孝义坊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,占地150平方米、藏书6000册的孝义书院揭牌。书架上摆着中外文学、历史地理、农业种植养殖等各类书籍。

刘瑞琦的这些举动,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,尤其是他的女儿。说起女儿,刘老师笑了,“哎呀,她从小也喜欢藏书,我每次背回来的书,她都要先挑选一遍,收藏起来!”

孝义书院建好了,他却像“候鸟”一样,带着藏书,走到哪里,就把书院建到哪里。

2021年,他在云南省安宁市温泉小村旅居,当地文化底蕴深厚,明代状元杨慎被贬云南,在安宁温泉住了30多年,创办遥岑楼(书院),讲经授徒,培养出“杨门七子”。刘瑞琦就想到要延续这个传统,就带了2500多册书,建“温泉书院”,在风景区“金色螳川”摆公益书摊,借出书籍200多册。

2022年4月,他与所在的成都市龙泉驿区同福社区共建同福书院,馆区面积500多平方米,藏书6000多册,提供免费借阅。

2023年1月,刘瑞琦把温泉书院搬到西双版纳州景洪市,改名为雨林书院,为旅居人员提供精神食粮,借出书籍300多册。

2024年8月,刘瑞琦在汉中市宁强县巴山镇旅居,在九年制学校门口,自建巴山书院,提供免费借阅。每逢学生上学、放学,他就摆书摊,学生围成一圈,看书、借书。有个孤儿,因煤气罐爆炸,半边脸烧伤了,父亲不幸遇难,母亲远走他乡,她只好与奶奶相依为命。家里没钱,没人给她补课,刘瑞琦就给她辅导英语。

2025年6月,刘瑞琦与汉中市佛坪县王家湾村村委会共建秦岭书院,连续两年举办假期英语辅导班,举办夏令营,组织学生参观非遗馆、萌宠乐园,看魔幻电影。

2026年,他在汉中市宁强县青木川古镇自建青木书院,藏书12000册,组建少年班,免费辅导英语,报名人数80多人。

除了建书院,他还有个特别的爱好“摆书摊”。“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人看书。”一位从事养殖的读者蹲在地上翻了半天,挑出7本书。过了几个月,这位读者让人寄回来两箱书,“他知道我爱书,特意快递给我,连邮费都没让我掏。”刘瑞琦说。

刚开始周围人不理解,说:“你把退休金都用了,以后咋办?”刘瑞琦笑了笑:“一开始家人也不理解,但后来他们看我整天忙得高兴,也就不说啥了。”

5座书院,累计投入50多万元。有人不理解他,他却只有一句:“只要有人看书,就值!”

让村子变成名副其实的“书香村”

“我最大的心愿就是,让书院一直存在下去,让更多的人从书中受益,让村子变成名副其实的‘书香村’。”

书院的门一年四季开着,节假日、周末,这里是孩子们的精神家园和娱乐世界。4年来,刘瑞琦在书院开设免费英语辅导班。连续两年,组织夏令营活动,参观区图书馆、国防学院科技展览馆、西安交通职业学校图书馆、户县农民画展览馆,开阔眼界、增长知识。

开设假期英语辅导课,他还自掏腰包准备了时令水果和糕点。“城里孩子接触英语的机会多,乡下孩子没有这个条件。办书院,不只是摆书,还要给娃们开辟一个能学东西的地方。”一段时间下来,不少孩子慢慢克服心理障碍,敢于开口讲英语。

除英语辅导之外,他还有更多设想。考虑到乡村家庭的实际情况,他计划联合区关工委“五老”志愿者讲述红色故事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,邀请数学博士讲数学,拓展公益课堂。他也希望拓宽孩子们的眼界,有机会就带孩子们走出村庄。

如今的孝义书院,已经成为本村及周边村镇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和学习阅读空间。“五老”志愿者柳绪绪经常来书院,最爱看养生保健类的书,“人老了,想多知道点保养身体的方法,书里头写得明明白白”。村民吴俊德常常来翻一些他喜欢的人物传记,“年轻时没条件读书,现在补上了”。

每到节假日,书院里总是热热闹闹,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翻阅绘本、欣赏漫画。

鄠邑区文旅局、区图书馆通过专项资金、图书流转、设备更新等方式,将孝义书院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,把它打造成为区图书馆分馆。

现在的孝义书院,也实打实地成了孝义坊村的知识乐园。

从农村娃到大学教授,再到建起5座公益书院的“乡村阅读推广人”,刘瑞琦几十年来,一直走在用书铺就的路上。

在旁人眼里,他是一位退休教授,是“西安好人”“陕西好人”“中国好人”,全国“乡村阅读推广人”,但是在他自己看来,他还是那个报答“1元钱”学费恩情的农村娃。他总是说:“我是读书受益人,我也想用读书改变生我养我成就我的孝义坊村!”

5座书院、5万册书、50多万元退休金。旁人眼里的伟大,在他这里只是一点一滴为乡村做事的平凡。他更喜欢面对一张又一张渴望读书的脸庞,“我在青木川,小朋友远远看见我,就大声喊‘刘老师、刘老师’‘奶奶,那是我的老师’,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!”

如今,刘瑞琦还在琢磨着建书院、摆书摊、教英语。总有人问他图什么,他回答不上来,只说自己是“读书受益人”。他觉得自己“把书念成了”“把事做成了”。这份“成了”,不是当上教授,也不是拿了“中国好人”,而是把书读好了,又把书“撒”了出去!

文化艺术报见习记者 殷艺嘉

本版图片由文化艺术报见习记者王靖洋摄



孝义书院“五老”及志愿者合影